

第二章 「抵抗」意味著什麼？語言哲學系譜的考察

在探討「抵抗如何可能？」之前，我們必須先對抵抗的意涵以及其中透露出的對語言／意義的立場進行理論性的探討，以清楚定位本研究的理論位置與研究焦點，並作為後續閱讀和批判 Bakhtin 所陳述的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如何作為民主化的實踐的背景知識。

由於本研究發現，Bakhtin 對抵抗（亦即語言／意義的民主化）的思考乃是本著對 Saussure 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批評，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延伸了 Foucault 的論述／權力觀點；同時，藉由與 Saussure、Foucault 的學說對話，我們也得以清楚看到 Bakhtin 的說法所標示出的當代語言哲學在語言／意義的立場上，逐漸把「言語行動」的重要性凌駕於「語言系統」之上並以前者作為主要課題的演進趨勢。⁴⁴這符合本研究對於「抵抗」乃是透過言說主體的表述而得以動員和實踐的的初步界定。

因此，下面將先探討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理論／概念的內涵與限制，接著說明 Foucault 的觀點以及 Foucault 式的論述分析如何另闢蹊徑思考抵抗的問題，最後以 Bakhtin 的「表述」(utterance) 觀點為基礎提出本研究對於「抵抗」的立場。

本章的焦點鎖定這些不同學者的論點所陳述的對語言／意義的立場與對抵抗的想像。同時，本章還試圖建立「抵抗」在語言哲學上的理論／概念系譜，並藉此對「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提供思考和批判的理論基礎。

⁴⁴ 這裡之所以強調「言語行動」逐漸凌駕於「語言系統」之上的語言哲學發展脈絡，也在為本研究選擇 Saussure、Foucault 作為探討 Bakhtin 的做法加以辯護。事實上，在當代語言哲學的發展中，Derrida 的解構主義可能與本研究想要探討的語言／意義的民主化問題在大方向上有某些重疊。然而，特別是 Derrida 在早期（例如：*Of Grammatology* 一書；1967/1997）的書寫雖然也曾試圖消解 Saussure 符號學理論中的諸多命題，比方說能指與所指的穩定對應關係，但基本上他是從 Saussure 所討論的「任意武斷性」和「差異」等概念對「語言結構」的性質提出說明，並據此解構結構主義所預設的封閉文本空間。而本研究雖然也試圖批判生產符號意義的封閉文本空間，但卻是從「言語行動」出發。這與 Derrida 解構主義的思維有典範上的差異。

第一節 抵抗是對社會系統的符號分析

Saussure (1972/2002: 65-66) 在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一書中曾經批評傳統「命名說」(nomenclature) 的語言觀認為語言是物理世界的反映以及預設對象 (object) 與名稱 (name) 之間具有先驗存在的穩定對應關係的說法，有以下問題：首先，它預設了先於話語 (word) 而存在的觀念 (idea)，以及先於觀念而存在的對象；其次，它無法說明名稱究竟是聲音的實體或是心理的實體 (vocal or psychological substance)；最重要的是，它可能導致我們誤以為「名稱」與「對象」之間本來就具有一種內在關聯性。Saussure 就在這個批評基礎上，提出他自己的結構主義符號學。

一、Saussure 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理論／概念內涵⁴⁵

首先，Saussure 認為語言和真實的關係並非自然天成，而是「系統」或結構的產物 (鍾蔚文，2004: 203)。因此，語言與外在真實並不存在著本質上的對應關係。他進一步指出符號的意義建立在符徵 (signifier) 與符旨 (signified) 之間的聯結關係，符徵代表聲音形象 (sound-image)，符旨代表與聲音形象所指涉的概念 (concept) 或在心中所產生的聯想。例如英文中的「tree」即是符徵，而 tree 在人們心中產生的形象與聯想則是符旨。

其次，Saussure (1972/2002: 119-120) 認為語言是「形式」(form) 而非「實質」(substance)，因為意義來自於符徵與符旨之間「一對一」的「任意武斷性」(arbitrary) 關係。所謂的「任意武斷性」，是說符徵與符旨之間的對應關係是語言社群所約定俗成的產物；同時，此一約定俗成的方式乃是藉由符徵與符旨與系

⁴⁵ 以下對於 Saussure (或第二節對於 Foucault) 的討論並不意圖完整地說明其所有的論點，而只就與本研究有關的部分進行探討。

統之中其他的符徵與符旨的差異關係而決定。例如：「母親」作為一個符徵，其符號意義的來源並不是在於它指涉了一個特定的事物，而是它與「父親」、「女兒」、「兒子」等系統中其他的符徵有所差異，並藉由彼此之間的差異關係而決定其意義。

最後，Saussure 將語言分成「語言系統」(langue) 與「言語行動」。語言系統是語言的深層結構，言語行動是實際的話語和表述。Saussure 並且指出，語言系統掌管了所有言語行動的秩序與意義，而它同時具有不可變動性和一致性，一旦被廣泛接受與使用，即使是專家、文法家、邏輯家也很難對其進行更動。相對來說，主體的言語行動則完全受制於語言系統本身的邏輯與規則。所以，符號學的任務則是以客觀、嚴謹的態度去分析抽象的、穩定的語言系統，而非去檢視受制於語言系統的隨機的、偶然的言語行動。而 Saussure 對於語言並非由主體所駕馭的主張，也與啟蒙以降以人為中心的主體觀，並認為人是充分自覺和自主的主體產生了歧異，可說是預設了一個「虛空的、不在場的人類主體」(王孝勇，出版中)。

一般認為 Saussure 的說法標示出人文與社會科學在智識上的「語言學轉向」。「語言學轉向」除了意味著學者開始注意語言在認知與經驗世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中介性角色，Saussure 對於意義、社會、主體的說法也廣泛地影響了後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

二、Saussure 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啟發與限制

首先，受到結構主義思潮所主張以客觀、嚴謹的態度歸納語言系統的規則，某些人文科學家開始嘗試重建其理論／概念的科學地位，並且摒除分析過程中過多的個人主觀經驗判斷。敘事學者 Genette (1972/1980)、Jakobson (1971) 或者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 Todorov (1975) 試圖標榜結構分析的科學性與客觀性，並

因此建立形式化的文本分析工具即為代表。本研究先前所提出的「書寫形式的意識形態分析」就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結構主義所啟發。

其次，受到 Saussure 駁斥了社會本質論所預設的「語言反映真實」，並認為意義來自於它在語言系統內各個部分的「關聯性」（例如：比較符號與其他符號之間的差異），而沒有符號具有自己獨立的意義等說法所影響，論者因此主張文本分析（包括文學批評）應去追溯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與意義網絡，而非單單從「文本本身」或「文本內在」去解讀意義與作者心中的想法（Allen, 2000; Barthes, 1977）。

最後，接續著對於文本互文性的關注，某些論者認為 Saussure 從「語言社群的約定俗成」來談意義的生成與語言系統的運作，意味著他強調「社會系統」在理解人類社會中的角色（Culler, 1974／轉引自 Howarth, 2000: 18）。在此，社會系統可被理解為一個「象徵系統」，諸如食物、圖騰、禮儀、制度等象徵形式的背後，都反映出「社會系統」的文化內涵（Levi-Strauss, 1968）。這個說法也對媒體研究有所啟發。傳播學者主張媒體文本可被視為是由符號所組成的一套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而對文本中的符徵與符旨加以說明，有助於檢視文化內部的社會符碼與文化成規如何對符號組成造成制約，而符旨在這裡可能更廣泛地與文化聯想與社會知識接軌（倪炎元，2001: 135；劉慧雯，2002: 219）。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結構主義符號學，特別是後續論者對 Saussure 觀點的推敲和延伸，對於探討「抵抗」問題最重要的啟發，應是它試圖提出一種對社會系統的符號分析視野與分析策略。這個分析的進路著重的是藉由對社會系統中的符號意義進行形式分析，了解主流意識形態的意義生產過程以及不同符號意義之間的互文性，並以此作為後續對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中的語言／意義進行解構或再建構的批判基礎。

然而，若以 Saussure 的論點以及 Saussure 式的結構分析思考語言／意義的民主化，也會產生以下的限制：

首先，結構主義原初的理論模型將語言視為「形式」而非「實質」，並主張

找尋所有言語行動背後放諸四海皆準的穩定的語言系統，雖然揭示出語言／意義的分析並不是詩學的、批評者個人美感經驗的抒發，而是必須進一步關注意義生產的物質條件（例如語言社群的共識）。但是以符號形式為唯一分析素材的結構分析並沒有辦法捕捉語言系統的意識形態面向，亦即特定歷史與社會情境在符號「內容」上留下的銘刻。例如以前述「母親」的例子來說，透過結構分析僅能夠讓我們從形式上知道「母親」在語言系統中與其他符號的差異關係，但是無法讓我們進一步理解「母親」這個符號的內涵為何？它反映出什麼樣的社會與歷史意義與意識形態（例如：家庭分工邏輯與性別角色期待）？對此，Bakhtin/Medvedev（1991: 118）認為結構分析流於形式主義化，有種「恐懼去分析作品中的意義」（fear of meaning in art）的傾向。這也提醒我們，在批評光就「內容層面」理解語言／意義的抵抗無法真正捕捉抵抗如何透過語言／意義的運作以實踐民主化之餘，也不應流於另一個過度強調形式主義的極端，而是應該試圖建構兼具「形式層面」與「內容層面」的研究策略，亦即前述提及的「書寫形式的意識形態分析」，才能對「抵抗如何可能？」以及語言／意義的抵抗如何在文本中呈現等問題提出比較適切的回應。

再者，Saussure 過分強調結構本身的完整性與穩定性，使他相信符徵與符旨之間有著自然的、單一的對應關係，而這個對應關係來自於一個封閉的、僵化的、無法輕易被言說主體所撼動的「語言系統」。在此，Saussure 等於把語言／意義視為一個「終端的產品」(product)而非「生產的過程」(a process of production)，此舉不但忽略了結構變遷的可能性，也無法分析社會行動者在促成社會與政治改革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Howarth（2000: 27-28）因此指出，Saussure 在破除社會本質論之後，卻形成了一種新的「結構本質論」。我們在結構主義原初的理論／概念架構下，幾乎看不到抵抗的可能性。

第二節 抵抗是對論述生產過程的歷史批判

雖然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觀點被認為確實透露出了分析社會文化中的意義系統的理論／概念視野而不限於狹隘的語言分析（例如：語音、字詞、語句的拆解），但是嚴格來說，Saussure 並沒有提供足夠的理論資源與概念工具去執行這樣的知識計畫。對此，Foucault 從「論述」（discourse）描述語言，並在系譜學時期提出權力關係如何生產意義、形構主體等說法，相當程度啟發了當代論述分析開始對語言／意義的論述生產過程進行歷史的批判。

一、 Foucault 論述／權力觀點的理論／概念內涵

在考古學時期，Foucault（1971/1972）提出了「論述」作為新的分析語言／意義的單位。按照 Foucault 的說法，論述是「由某個特定時空下的一組陳述（statement）所組成的」（p. 117）。陳述是一種遵循某些特定規則的話語，它並不等於只受到文法規則所管制的「語句」（sentence），也不等同於只受到邏輯規則所管制的「主張」（proposition），而是受到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所管制。也就是說，在某個特定的時代，會有某種特定的時代風格，它是一種系統、結構或文化符碼，而它更扮演著管制那個時代的語言／意義、認知、價值觀和論述實踐的功能。Foucault 將它稱之為「論述形構」（Foss, Foss, & Trapp, 1991／林靜伶譯，1996）。

此外，由於論述形構限定了在特定時代中什麼樣的陳述可被說出來（sayable）或被看見（visible），所以 Foucault（1989: 18-19）指出考古學的任務是藉由找出各種論述彼此之間的「散亂中的規則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以及各種論述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探討論述秩序生成的物質條件（materiality）。如同鍾蔚文所說（2004: 222）：「若用地質學的比喻，Foucault 的重點不在地形生成的基本原則，他的問題是：『某些地貌出現的條件為何？』」。

到了系譜學時期，受到 Nietzsche 賦予系譜學一個「譯解」(decipher) 的功能，並主張藉由探究已被自然化和普遍化的道德價值觀建立的可能性條件、發展與演變，以彰顯其原初的暴力面貌等說法所影響，Foucault 轉而對「影響論述的非論述實踐」(例如：監獄制度、國家治理) 進行考察，並修正了過去對於「權力」的看法，具體說明權力關係中的論述生產與主體形構過程。

Foucault (1980) 指出有別於過去的主權理論 (theory of sovereignty) 將權力視為一種壓制性的、可被持有的力量和權利 (right)，17、18 世紀以來出現了一種新的權力 (經濟學)，這種權力是以最小的支出換取最大的權力利潤，具體來說則是透過論述生產主體對自我的認知與規範。而透過將這些認知與規範加以內化，主體開始進行自我管控，如同《規訓與懲罰》中處於「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 中時時保持被監視的警覺因而進行自我監控的囚犯。論述因此成為了管理自己的技術。

雖然 Foucault 的論述／權力觀點指出權力具有生產論述、規訓主體的功能，但是他也指出「在權力關係的中心並作為它們存在的永恆的條件，總存在一種不服從性和某種根本的倔強性」(1982: 225)、「每一種權力關係都含有一種鬥爭策略」(ibid.)、「權力之所在，即抵抗之所在」(Foucault, 1980／尚衡譯，1990: 82)。他還進一步提出系譜學的任務就是要去「使那些被貶抑的、不合法的知識運轉起來，以反對以真理或科學之名的理論和知識」(Foucault, 1980: 83)。雖然一般認為上述這些宣示因為 Foucault 後來的倫理學轉向而並未被充分地理論化 (Han, 1998/2002)，但卻也暗示了論述是意義角逐的戰場，論述形構並非永恆不變的永恆的真理。而透過建構新的真理政權 (regime of truth) 取代舊的，我們得以成為意義抗爭的主體。如同以下的說法：

我們可以在不合理的政治情境所導致的宰制狀態之基礎上提出批評，藉由參與某種真理遊戲，展現其結果，指出尚有其他合理的選項 (Foucault, 2000: 296)。

二、 Foucault 論述／權力觀點的啟發與限制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Foucault 的論述／權力觀點可說是透過對陳述、論述背後的論述形構與非論述機制進行系譜學分析，以辨識特定的歷史情境與其中的權力運作邏輯。再者，不同於結構主義者把語言／意義的運作範圍侷限在封閉的語言結構中，Foucault 藉由揭示了語言／意義並不是被語言系統所給定的（given），而是在權力關係運作中所生產出來的，暗示了語言／意義具有某種變動性而非穩固性（Best & Kellner, 1991／朱元鴻、馬彥彬、方孝鼎、張崇熙、李世明譯，1994）。Foucault 並且說明了所謂的語言／意義變動性是藉由以一個新的真理政權取代舊的真理政權解構而得以實踐。而這點更啟發了後續論者進一步從 Foucault 的說法推敲言說主體如何在權力關係中進行抵抗，並發展出具體的抵抗策略。例如：Lacalu 與 Mouffe（1985）提出的「敵對」（antagonism）；Butler（1999）提出的「言過其實」（hyperbolism），都在試圖批判性地檢視論述生產過程背後所反映的歷史情境脈絡，並據此建構一個新的真理政權與意義系統。⁴⁶在這裡，意義的變動性成為了具有特殊政治意圖的抵抗，而抵抗更可說是言說主體透過經營特殊的語言「形式」和策略而實踐的歷史批判。

然而，不同於 Foucault（1971/1972）因堅持「語言是在特定的物質與歷史條件下發展和產生意義」而反對用任何詮釋的方法揭露語言／意義背後的權力運作模式，以 Fairclough 為首的批判語言學家或批判論述分析學派主張應用 Foucault 的觀點於實際的文本意識形態分析，有助於具體地揭示「社會權力的濫用、宰制與不平等如何藉由論述而鞏固與再生產，又如何藉由論述被抵抗」（van Dijk, 2003: 352），是為「文本導向的論述分析」（text-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TODA）

⁴⁶ 本研究在第四章的部分會對「敵對」和「言過其實」進行深入的探討。這裡我們只需要知道這些抵抗策略乃是受到 Foucault 的啟發而發展出的觀點，而這些理論／概念的目的則在幫助我們對論述生產過程與其歷史條件進行批判，並建構新的意義系統。

(Fairclough, 1992)。

在具體的分析策略上，Fairclough (1989, 1992) 認為 TODA 可吸收 Foucault 在考古學時期視論述為建構知識的力量，以及正視論述與所處的社會和制度之間的關係，並納入系譜學時期從權力的觀點將論述所生產的知識或意義視為「真理政權」等說法，從「文本本身」、「文本中論述的生產過程」、「論述生產的社會情境條件」等三個面向對「論述生產過程」進行文本的意識形態分析。

TODA 的研究策略固然延伸且應用了 Foucault 的理論／概念，也對社會情境或歷史條件對論述生產所產生的影響，提出了兼顧形式（例如對文本的論述生產過程與其中不同文類之間的關聯性）與內容層面（例如對文本本身進行語言／意義的分析）的分析視野。但是，我們從多數 TODA 的分析中來看，批評者多半強調的是語言／意義的強制性，亦即把語言視為社會優勢階級維持既得利益或遂行宰制的工具，而主體只能被動地接受語言中所傳遞的意義或價值觀 (Fairclough, 1989: 74)。於是，如何培養「批判的語言自覺」(Fairclough, 1995b: 221)，就成為了 TODA 最主要的研究旨趣與對社會改革的想像。這樣的研究旨趣也呼應了 Habermas (1973) 藉由批判以促成主體解放的終極關懷。相對來說，主體如何「在社會與語言／意義之間的辯證關係（而非單向因果關係）中影響社會」(翁秀琪，1998: 94)，則較未受到關注。

本研究認為，如果我們還記得 TODA 對於「宏觀的社會結構關係和微觀的社會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翁秀琪，1998: 92)的正視，以及 Foucault (2000: 296) 對於「以一個新的真理政權取代舊的真理政權」的呼籲，那麼在洞悉語言／意義的權力本質並對其加以批判之際，若能更進一步地思考言說主體如何「由下而上地」生產反對論述以進行意義或意識形態的抗爭，不但更將對民主化的實踐更具關鍵性的貢獻，也更真正地貼近 Foucault 系譜學以及 TODA 的原意或承諾。

以下，本研究將從 Bakhtin 對「表述」的觀點說明當代語言哲學在典範上的轉變，並從中延伸探討 Bakhtin 透過「表述」透露出的對於「抵抗」的思考與想像。

第三節 抵抗是傳播／溝通與對話中的意識形態鬥爭

相較於 Saussure 符號學理論重「語言系統」輕「言語行動」的主張，以及 Foucault 式論述分析比較強調探討特定時代或歷史中的權力關係如何生產宰制的意識形態，Bakhtin 的語言哲學，特別是他對於「表述」的說法，可說是倒轉了語言系統和言語行動的主客位置，並透過強調人與人在傳播／溝通情境和互動過程中的「表述」才是探討「意義從何而來？」的起點，提出另一種思考語言／意義問題的視野。對此，語藝學者 Schuster (1998: 2) 以「Bakhtin 典範」的命名來說明 Bakhtin 學說對當代語言哲學思潮的影響。

此外，Bakhtin 對於「人使用語言」以及「傳播／溝通情境中不同話語意識的交錯」的討論，也被後續學者（例如：Hall, 1995）認為在思考語言／意義的民主化問題上有相當關鍵性的影響，更對後結構主義的論述理論（例如：Laclau 與 Mouffe、Butler 等人的主張）有相當程度的啟發。

以下，本研究將從 Bakhtin 對 Saussure 的挑戰、Bakhtin 論「表述」的「社會性」與「對話性」來討論 Bakhtin 「表述」觀點的理論／概念內涵，並說明此一觀點對於「抵抗」的意涵和可能性提供了哪些可以延伸的面向。

一、 Bakhtin 「表述」觀點的理論／概念內涵

首先，Bakhtin 具體羅列出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在以下這幾點上流於「抽象客觀主義」(abstract objectivism)：

1. 語言是一個穩定的、不變的語言學形式的規範系統。此一系統並且是已然存在的，也是無法被個人意識挑戰的。

2. 語言（學）的法則存在於一個封閉的語言學系統之內，符號間彼此的連結關係。
3. 語言現象與意識形態、價值或動機無關。在話語（word）與其意義之間，沒有任何自然的、可理解的意識與藝術。
4. 說話的個人行為僅僅是對規範性語言學系統的折射、變異或歪曲。這雖然可能造成語言學形式的改變，但是從語言系統的角度觀之，那些改變是非理性的、無意義的。所以，語言系統與其歷史之間沒有任何關係（Vološinov, 1929/1986: 57）。

所謂的「抽象客觀主義」，是源自於 17、18 世紀理性主義與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的傳統且受到笛卡兒以降的啟蒙思潮所影響，主張從一種類似機械式的角度看待語言中的意義產製。在這種機械式的角度之下，語言／意義被比喻作數學公式一般，公式間的元素必須緊密結在一起且不可被任意更動（否則就變成一個不容於系統的新公式），而所有的符號只要依循數學公式本身的規則和邏輯，就可以產製出社會性（social）的、穩定不變的意義（Vološinov, 1929/1986）。此外，Bakhtin 也指出抽象客觀主義的語言學也無法分析語言／意義中的意識形態（亦即聲音／腔調）以及在歷史洪流中不停變動的社會價值觀，充其量只能研究字典中的「死的語言」。

然而 Bakhtin 認為當我們在具體對話的傳播／溝通情境中，其實很少感受到 Saussure 所說的語言系統的規範性效應。這並不是說語言系統全然地不存在或言語行動並不受限於任何規約，而是說主體在表述的那一刻，所面對的應該比較是傳播／溝通情境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對話關係，以及「既存的意義類型」（Allen, 2000: 18）。這裡所說的「既存的意義類型」可被理解為「語言／意義所體現和反映的不停變動地社會價值觀與社會位置」（ibid.），而並非抽象客觀的語言系統。

在此我們可以明白看到 Bakhtin 傾向從「傳播／溝通情境中」的「語言／意

義運作過程」思考「意義從何而來？」的問題。同時，Bakhtin 也指出此一過程雖然看重的是「人使用語言與他人互動／對話」，但是「言語行動」並非隨著主體個人意識而任意操弄的「唯意志論」產物，而是受到「既存的意義類型」所影響。⁴⁷

Bakhtin 對於「既存的意義類型」所反映出的「社會價值觀」的強調也與他對於「表述」具有「社會性」的說法有關。Bakhtin 指出在抽象客觀主義的論點廣泛影響當代語言哲學之際，隱隱然有一股勢力與之對抗，即是源自於浪漫主義傳統且於德國發揚光大的個人主觀主義（individualistic subjectivism）語言學。個人主觀主義的語言學雖然從主體的表述／言語行動探討語言／意義的產製與運作，並且正視語言／意義中所反映的聲音／腔調與言說主體的意識形態，亦即沒有不帶聲音／腔調的話語，但是 Bakhtin 認為此派學者單單從言說主體個人的內心世界層面去理解表述的意識形態本質，認為言說主體的話語意識是先於表述而存在的「個人情感表現」（expression）的外在化產物，無法說明特殊的歷史、文化、社會體制與語言／意義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Bakhtin, 1975/2002; Vološinov, 1929/1986）。值得一提的是，Bakhtin 此處對個人主觀主義的批評呼應了他在另本著作中以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為靶子，駁斥西方哲學過分強調個體主觀慾望和感覺而忽略個人心裡活動的社會性和歷史性的說法。Bakhtin（Vološinov, 1987）甚至指出這種哲學觀有種「反歷史」和「反社會」的傾向。

透過對 Saussure 結構主義符號學流於「抽象客觀」以及德國語言學派流於唯心和「個人主觀」的挑戰，Bakhtin（Vološinov, 1929/1986: 99）提出「表述整體」（utterance as a whole）作為探討與分析語言／意義的切入點。

「表述整體」又可稱之為「主旨」（theme），「主旨」是「產生表述的具體歷

⁴⁷ 後來 Bakhtin（1979/2004）進一步把「既存的意義類型」說成是「言說類型」，並說明它對於言語行動所產生的限制。研究者在另篇論文中曾經藉此對於 Bakhtin 如何思考語言與人的關係進行探討，並發現主體既可自由地使用語言，但也無法全然擺脫語言的枷鎖，應是 Bakhtin 在語言哲學時期所想像的語言／意義與社會生成的可能性條件（王孝勇，出版中）。

史情境之表現」(Vološinov, 1929/1986: 99)。⁴⁸例如我們每次問說「現在幾點鐘？」都依照當時傳播／溝通情境而可能有不同的涵義，有時候是在問時間，有時候可能在催促別人動作太慢；同時也可能反映出特定社會文化中對於生活或工作的不同思考，因為有些社會價值觀認為精確掌控時間是提升工作效率的關鍵與基本的生活態度，但也有其他的社會或許比較從一種輕鬆的態度看待生活或工作，所以詢問「現在幾點鐘？」可能並不是急於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手邊正在處理的事情。

綜上所述，Bakhtin 指陳探討語言／意義應從傳播／溝通情境中的「表述整體」著手。Bakhtin 並且指出，言說主體如何在與他人表述對話的傳播／溝通情境中，回應他人針對特定議題而產生的聲音／腔調以及這些聲音／腔調所處的社會歷史，並進一步在此基礎上「挪用」(appropriate) 他人表述，提出自己的聲音／腔調與意識形態立場，則是探討語言／意義時最核心的命題。⁴⁹

二、 Bakhtin 「表述」觀點的啟發與限制

Bakhtin 對「表述」的說法除了修正了 Saussure 符號學理論不看重「言語行動」並且將「語言系統」視為永恆不變的產物等說法，並藉此標示出語言／意義在傳播／溝通情境中的變動性與開放性，也啟發了後續學者進一步思考如何延伸 Bakhtin 的觀點進而揭示出在傳播／溝通情境與對話過程中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可能性。例如 Hall (1995) 曾經引述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中的某段文字指出 Bakhtin 與受到 Gramsci 「霸權」理論／概念或 Foucault 論述／權力觀點影響的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所關注的不同階級的社會團體如何透過語言／意義生產反對論述以進行社會改革的過程，似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段文字如

⁴⁸ 雖然 Bakhtin (Vološinov, 1929/1986: 99) 曾說這裡的「歷史」是一個微觀的概念，用以形容對話情境中，此刻所說的話到下一秒鐘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對照 Bakhtin 對於表述「社會性」的說法，「歷史」應可延伸來指涉特定時期與社會中的價值觀。

⁴⁹ 至於 Bakhtin 如何操作傳播／溝通情境中的對話過程與話語挪用，將留待第四章的部分再加以探討。本研究在這裡強調的是 Bakhtin 如何發展出與其他語言哲學不同的思考語言／意義的方式。

下：

符號所反映的存在 (existence) 不只是種反射 (reflect) 而是種「折射」(refract)。⁵⁰ 這種存在的折射是如何在意識形態符號之中被決定？是藉由每個意識形態符號之中，不同面向的社會利益相互交錯所決定的。符號因而變成「階級鬥爭」的場域。……一個符號若是失去了社會鬥爭的面向，跨出了階級鬥爭之外，則不再是理解活生生社會的課題，而是語文學 (philology) ⁵¹ 探討的對象 (Vološinov, 1929/1986: 57)。

上述這段文字明白指出符號作為意識形態鬥爭與階級鬥爭的場域，才是 Bakhtin 所想像的「活生生的社會」(Vološinov, 1929/1986: 57) 的課題。事實上，在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的第一章，Bakhtin 曾指陳將語言／意義納入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討論，具有迫切性與必要性。因為對 Bakhtin 而言，馬克思主義從商品交換來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成，並以經濟決定論的角度預設基礎結構 (basis) 與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 之間二元對立的關係，漠視了商品地交換也牽涉到語言／意義的交換，而社會衝突或階級鬥爭的發生除了與經濟因素有關之外，更有意識形態的面向。Bakhtin 並且於隨後提出了三點方法論預設，主張以符號作為中介並據此探討基礎結構與上層結構之間的「因果」(casually) 關係，亦即現實的存在 (經濟因素) 如何決定符號，符號又如何反映和折射存在的生成：

⁵⁰ 符號意義以及主體性形構之所以是種「折射」而非「反射」，可能有以下兩種詮釋：其一，這是因為 Bakhtin 認為主體並非「獨白地」在傳播／溝通情境中自我表述，主體的表述必然牽涉到與他人的聲音／腔調之間的互動關係與過程。也正因如此，語言／意義的生產與主體性的形構則是藉由與他人表述進行比較，並從中「折射」出自己的意識形態此一過程而得以實踐。這點後續論及表述的對話性與小說的文類特性時會再詳細說明。其二，如同劉康 (1995: 160) 所言，這是因為 Bakhtin 認為語言的意識形態鬥爭具有「獨立於經濟利益與政治社會制度之外的自身規律」，亦及馬克思主義中，與「結構主義」相對立的「文化主義」陣營所標榜的意識形態的相對自主性。⁵¹ 在 Bakhtin 的書寫中，「語文學」與 Saussure 的符號學一樣，都是用抽象客觀的方式來理解符號的意義。Bakhtin 還形容語文學者彷彿扮演著神父一般的角色，負責翻譯神聖的、凡人無法懂的外來語 (alien and foreign word) 給一般大眾。而這些外來語同時也是「死的語言」(Vološinov, 1929/1986)。

1. 意識形態無法與符號的物質真實分離，以及不能把意識形態歸入「個人心理意識」或其他無法捉摸的領域。
2. 符號無法與具體的社會交際形式分離，否則它只是一種簡單的物理東西，或者什麼都不是。
3. 傳播／溝通與其形式不能和物質基礎結構(material basis)分離(Vološinov, 1929/1986: 21)。

整體而言，上述討論可以看到，語言如何作為抵抗的場域，或語言所反映出的不同意識形態的對話、對峙，始終是 Bakhtin（或馬克思主義者）關切的議題。同時，這也正是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思考語言／意義的抵抗時，主要的立論基礎（Sarup, 1993）。在此，本研究認為，語言／意義的抵抗意味著：言說主體在傳播／溝通與對話過程中，藉由洞悉社會系統中符號意義的生產與運作邏輯，並對其中所反映出的情境脈絡或歷史條件進行批判性的檢視，據此對主流意義系統進行解構或再建構的意識形態鬥爭。同時，抵抗的可能性則是建立在上述傳播／溝通與對話過程中，藉由經營或維繫一種得以將主流意識形態加以「挪用」的形式條件，並以此作為言說主體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或生產反對論述的起點。

然而本研究也發現，至少在 Bakhtin 探討語言問題的相關著作中，並沒有直接處理「抵抗」的問題。而上述對於語言／意義的階級鬥爭或意識形態鬥爭的說法只是稍微提及但並沒有被進一步地說明或理論建構（王孝勇，出版中）。換句話說，Bakhtin 此時對於言說主體「挪用」他人表述以「折射」出自己價值觀的說法，並不具有顛覆象徵秩序的意涵，而比較像是言語行動中必然會發生的與言者有限度的自我意識的展現或與回應情境需求有關的自然反應。

另外，從上述的討論中也可看到 Bakhtin 研究語言／意義的其中一個初衷，乃是源自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補充和修正。因此，「階級鬥爭」的分析可說是 Bakhtin

所研究的主要議題之一。但是，除了將「階級」置於社會變遷或政治改革運動中的關鍵地位，**Bakhtin** 對語言／意義的觀點是否可被轉化或借用來對其他議題或不同社會行動者所動員的意識形態鬥爭過程進行分析（例如：性別議題）？這點似乎還需要更多的推敲。

對此，本研究認為我們首先需要先借助 **Bakhtin** 晚期對於狂歡節抵抗意涵的說明以及其中涉及的對意識形態鬥爭過程的分析為基礎，再回過頭來重新閱讀 **Bakhtin** 在語言哲學時期所揭示出的語言／意義何以具有意識形態鬥爭的特性或其運作模式何以作為抵抗的形式條件，才能夠較為完整地理解 **Bakhtin** 如何思考抵抗的意涵與可能性。這是因為對 **Bakhtin** 而言，狂歡節是最能凸顯抵抗意涵的社會文化現象，而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運作更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考「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並進行理論建構。其次，本研究也將融入後結構主義論述理論的說法，試著拓展 **Bakhtin** 語言哲學的在分析上的適用範圍，並規劃「抵抗如何可能？」的政治方案。

下一章將介紹 **Bakhtin** 晚期對於狂歡節語言與意義的說法，並對這些說法在理論推演和政治實踐上隱含的問題。第四章則藉由 **Bakhtin** 所提出的「眾聲喧嘩」、**Laclau** 與 **Mouffe** 的「接合實踐」，以及 **Butler** 的「論述行動」與「身體展演」等觀點，對「抵抗如何可能？」進行理論建構與再詮釋。